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专稿

感　言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目前，它的许多研究人员正全力以赴投入国家重点学术工程《清史》的编撰之中。

清史是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分枝，它历时三百年，内容丰富，资料浩瀚，变化迅速，道路曲折。它显示过自己耀眼的光辉而又充满了许多苦难与屈辱，清朝覆亡刚刚九十六年，距离今天很近，和现实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有着重大的启迪教育意义。

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学问，现实从过去而来，植根于过去之中，要透彻理解现实，必须向过去求教。为了揭开现实的面纱，分辨那些朦胧混乱的现实问题，明智的观察者常常需要退后几步，去观察它在过去历史时段中的存在形式。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思自己过去的民族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过去的历史可以教会人们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可做什么,而这只有在人类过去获得了怎样的失败,并经过总结反思之后才有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致力于研究和撰述清史的原因。

传承与超越

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30 个寒暑，短暂而又漫长。创业之甘苦，学海之浮沉，师友之聚散，世事之往复，一缕缕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说这 30 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实在并不仅仅是诗人的浪漫和夸张。但是，清史所建所以来，不说别的，仅以科研工作而言，30 年间一共出版了 244 部专著，发表了 2000 余篇论文，连同主编的各种书籍、资料、古籍整理、译著等等在内，学术成果达两亿四千余万字之多，这却是所有现在以及曾经在清史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埋头苦干，辛勤劳作，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学术生命。这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无悔的路。

一、我同清史研究所的历史因缘

我同清史研究所发生关系，其实并不是在 30 年前，而是在 43 年之前——虽然那时候还根本

没有清史研究所这个机构的存在。

1965年秋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国庆节后不久，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孙泱副校长要找我谈话。我如约而去，谈话是在孙泱同志家里进行的。他告诉我，国家已经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我校郭影秋校长、戴逸同志都是委员会成员。清史编纂任务以人民大学为主来承担。为此，学校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专门学术机构，由戴逸同志任所长，你任副所长，协助戴逸同志工作。同时他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那个时候，人大的系、所领导，都是一些老革命、老的著名学者，像我这样30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当副所长，不说是“破格”，至少也是“破例”了。学校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戴逸同志的推荐。戴逸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当教研室主任时我又做过他的副手，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但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郭影秋同志刚调来人大时，我恰好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历史的真实》的文章。影秋同志是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的，他看到文章后，跟我谈过一次话，这也许同让我当副所长的事不无关系。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根据。

但孙泱同志谈话以后，我很快就被借调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自然也就搁置了下来。谁知道一拖就拖了整整13年！

“文革”开始时，清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都还在河北邢台搞“四清”。戴逸同志和我，因为分别被借调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没有去邢台，“文革”起来就回了学校。我们听着广播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516通知》，天天看着学校其他单位轰轰烈烈地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记得有一次，我同戴逸同志在北海公园的“濠濮涧”整整呆了一天，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心中一片茫然，既说不清下一步事态会如何发展，也想不出一点切实的对策。只是相对唏嘘，黯然神伤。

等邢台“四清”的同志们回校以后，尚钺、戴逸同志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另外五位同志作为“走资派”，跟尚钺、戴逸同志编在一起。好在我官位太小，只是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所以除了陪斗及游街一次以外，倒也没有遭到更多的折腾，只是每天集中学习和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和自我批判的材料。

接着就是到人大“五七干校”。人大被解散后，便被分配到北京市革委会工作。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后，成立了新的中共北京市委，我在市委宣传部，先当副处长、处长，后来当了宣传部副部长。

所以，不论是北师大的清史研究小组，还是人大复校后成立清史研究所，我一概都没有赶上。我虽然同清史研究所发生关系最早，却并不是清史研究所的“开国元勋”。我真正进入清史研究所，其实比很多人都要晚一些。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大学复校。此后不久，尚钺同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回校参加历史系的工作。戴逸同志也让人带来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但他希望我回到清史研究所。我本来无意于仕途，又始终未能忘情于史学；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又既是我的史学启蒙老师，又是我的老领导，我当然欣然从命，决定回校。影秋同志得知此事后，特意在他所住的医院中约见我一次。郭校长征询我愿意到历史系还是到清史所，我表示愿到清史所，同时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到所里以后，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当时影秋同志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强调说：既然决定走学术发展的道路，就要安下心来，甘于寂寞，心无旁骛，刻苦钻研，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够取得学术成就，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影秋同志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79年8月，我正式到清史研究所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除了读书、写作之外，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杂务的干扰。这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集中精力专心读书的时段之一(还有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到1981年底，在戴逸同志的反复要求下，我

又担任了副所长的职务。

1983 年 4 月，学校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戴逸同志兼任历史系主任。戴逸同志十分发愁，因为这样一来，要同时兼管清史所和历史系两个单位的工作，势必把全部精力陷入行政事务之中，不可能再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必定会大大削弱清史所的工作。学校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究竟怎么办？当时几乎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经过多次商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戴逸同志去兼任系主任，但只是挂名，把我调离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去担任副主任。历史系的实际工作都由我来负责，戴逸同志只在重大问题上把把关，在重要场合出出面。平时他仍然集中精力领导清史研究所。就我个人来说，这件事看起来有点离奇可笑：为了保证清史所的工作，我离开了清史所。但从全局出发，这样做，显然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我协助和配合戴逸同志工作，通过类似这样的曲折的形式，却并不是仅有的一次。

过了两年，学校同意戴逸同志不再兼任历史系主任，由我担任系主任的职务。这样一来，我同清史所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1985 年 9 月，中央任命袁宝华同志为人民大学校长，我调任副校长。宝华同志同我谈话时，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我的组织关系，既不放在校部，也不放在历史系，而转到清史研究所。宝华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深意，也许只是出于对清史所难以割舍的情怀。现在看来，把我的组织关系放在清史所，不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对于清史研究所，都是很有好处的事。应该说这步棋是下得对的。从那以后，不论我担不担任行政工作，我都没有中断过清史所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清史所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我也力所能及地为清史所的发展作一点自己的贡献。我始终以作为清史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衷心希望清史所能够不断进步，兴旺发达。

二、我们这样走过

清史研究所创建之日，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始之时。清史所 30 年的发展史，恰好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同步。大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为清史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力推动，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正确指引，如果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清史所要取得今天的业绩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应该庆幸赶上了这样好的时代，应该感谢社会各个方面对清史所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客观环境对清史所的发展是个重要条件，而转化成发展的现实毕竟还要靠自己的艰苦努力。30 年来，清史所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传统。那末，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学术薪火不断传承下去的呢？我个人以为，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第一，形成一个既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特色。清史研究所的成立，目的和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为修纂新的大型清史作学术准备、队伍准备，到条件成熟时，作为清史纂修的骨干力量。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既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又为历史和现实、学术和社会的结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年来，清史所

的学术成果，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较好的影响，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认可，正是因为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这个学科特色，千方百计地来打造和丰富这个学科特色。主攻方向明确，问题意识强烈，奋斗目标清楚，大局观念鲜明。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一起为着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清史所发展到今天的精神动力。

第二，组织一支既各具个性又有强烈团队精神的学术队伍。任何事业都是要靠人来干的。一个学术单位的队伍状况怎样，决定着这个单位学术事业的兴衰隆替。清史研究所这些年来的发展，同清史所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学术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分不开。说起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能不谈到戴逸同志在这方面所花的心血。戴逸同志对于清史研究所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二是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不仅他自己对整个清史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围绕着清代历史，设计并组织了一系列大的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史编年》、《清通鉴》等，所有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在他的设计、策划以及直接组织、领导下完成的。队伍建设，更是戴逸同志极为关心并且尽心竭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观察和体会，戴逸同志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三招：一是示范，二是传授，三是压担子。示范，就是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他对学术执着追求，刻苦钻研，青灯黄卷，乐此不疲，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无须多说什么，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学生，自然不敢偷懒，不敢懈怠，不知不觉地就会跟着去做。这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无形的力量。我想，作为学术带头人，没有这一条，只会夸夸其谈，说得再多，也是带不出好的队伍来的。传授，就是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没有保留地告诉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我当学生的时候，戴逸同志不仅亲自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而且多次给我们作读书和研究方法的报告。怎样写卡片，怎样做索引，怎样确定研究主题，怎样出科研的副产品，如此等等，这些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都是第一次从戴逸同志那儿听来的。压担子，就是到一定时候，戴逸同志就根据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个人特点，放手地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

戴逸同志对人才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缤纷多样。在这样的人才观影响下，清史所的学术队伍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优点，就是每个人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大家的研究领域，在“清史”这个大范围下，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也互有差异，有的长于理性思维，宏观观察；有的善于资料发掘，微观描述。甚至言谈举止、文字风格等也都各不相同。尊重不同的个性，就使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人的聪明才智。

当然，只讲个性不讲共性，只讲个人意识不讲集体观念，一个单位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没有凝聚力，形不成合力，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大的学术成果，少则几卷，多则十几、二十几卷，参加者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是相互协作、集体攻关，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这些著作的完成，表明清史所的学术队伍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

第三，培养一种既严谨求实又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学风，是指对待学术的态度和作风。学风的好坏，于学术的兴衰关系甚大。学风正则学术兴。毛泽东同志曾说：“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我国传统史学对治史一直有很严格的要求，始终强调写史必须根据事实，“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只有“指事说实”，才能写出信史。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尊重历史的真实，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善恶是非加以客观公正的褒贬和分析评论，写出真正的信史，正是史学良好学风的根本要求。而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要严谨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妄浮躁。有的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一谈严谨扎实，就同“保守”、“僵化”联系起来。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难不成学术创新，竟然能够建立在轻浮操切、率性任情、天马行空的基础上么？这些年来，清史所的同志们，不论在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在研究领域的开辟拓展，在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研究视角的独特选取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有的甚至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所有这些学术上的创新，都是经过潜心的钻研、艰苦的探索、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取得的。清史所成立以来，共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49 项，65 人次。其中包括中国图书奖 3 项，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 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 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8 项，茅盾文学奖 1 项。虽然这个数据并不是衡量学风好坏的直接指标，但至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清史所学术成果的认同程度。我想，从总体来说，清史所的同志们，力求做到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风格。

第四，树立一种既坚持自主发展又重视交流合作的学术心态。我一直认为，尽管社会上对学术腐败或学术失范或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啧有烦言，但相对而言，学术界毕竟还是一方净土。学术评判总体来说还是公平的。你作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少成就，社会上还是会给你相应的承认。而一味靠包装、靠炒作，或者靠关系之类，终究难以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如果这个判断大体不错，那末就可以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学术单位，只有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通过踏实钻研取得学术成果，才能够得到发展，才能有自己的地位。清史所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些年来，大家也确实是这样认识，这样去做的。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与世隔绝，关起门来搞科研，是不行的。我们的研究，必须要融人社会，融入学术界。既主动参与学术界的各种活动，也努力争取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史学界同仁们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热心关爱，清史所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在 30 年所庆之际，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这一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外学术交流也大大地开展起来，这为清史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些年来，清史所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论在接受外国访问学者方面，在派遣本所学者出国进修或讲学方面，在培养国外博士生方面，还是在主办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第一位外国历史学博士生就是从清史研究所培养出来的。

30 年时间，值得一说的事情还有很多，这里只是选出几点，谈一点自己的感受，算是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也就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只是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之上。这个历史新起点，既由以往的全部历史积淀打下坚实的基础，也由新的时代提供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实现新的超越。

清史研究所如何适应时代要求，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个问题，大家一定会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作为一个老兵，我也谈一点想法，因为并不是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只是随意发一点零星的议论，未必能讲到点子上。

我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的“增强”。

一是要增强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性。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学问。正像胡锦涛同志所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知情达势的认识功能，鉴往知来的借鉴功能，启迪心智的教育功能。为了很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正确理解历史和现实、学术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学术有自己的本质属性，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属品，学术不是政治的奴

仆，历史同现实也不应该简单类比，牵强地拿历史为现实作注脚。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包括史学研究，总有它一定的现实目标，总是为了满足和解决人们的现实需要而有存在的价值。脱离现实生活的所谓“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也好，“为学术而学术”也好，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我国任何一部史学名著，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者自己都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离开了“资政育人”，“鉴古知今”，历史学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内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的史学工作者，就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二是要增强高质量完成国家清史工程的责任感。前面说过，清史所的成立，目的就是为编纂新的大型清史作准备。现在，国家清史工程已经正式实施，这对于清史所来讲，既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极好契机，也赋予了极为重大的历史责任。戴逸同志担任了清史编委会主任、清史工程首席专家的重任，清史所的许多同志，或者是重要学术组织工作岗位的主持者，或者是课题的参与者和承担人，清史所在客观上已成为清史工程的骨干力量。清史工程同清史所的发展，完全是一致的，统一的。把清史工程同清史所的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认为清史工程影响了清史所的发展，或者认为清史所要在清史工程以外另找出路，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认识和做法。清史所要在高质量完成清史工程中求发展，又通过清史所的健康发展推动清史工程的高质量完成。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互利双赢。

三是要增强清史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计划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条件。近年以来，党和国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不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说，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大有作为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史所理应迈出新的步伐，作出新的业绩，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在这里，前面讲的是学科建设的方向，后面讲的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对于我们清史所这样的基层学术单位来说，这些总的方向、目标和要求，如何落实，如何贯彻，如何具体化，需要结合清史所的实际，进行具体的谋划和深入的思考。不管工作会有千头万绪，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永远是研究所工作的最主要的内容。而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效，靠自发性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有具体的方案，有切实有力的措施。

清史所曾经有过美好的过去，在祝贺30年所庆的时候，我们相信，清史所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